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

李芬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

李 芬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 / 李芬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202-10810-9

I. ①新…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 IV. ①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6467 号

书 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
著 者	李 芬

责任编辑	王 静 陈冠英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袁会同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 75
字 数	145 000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10810-9/D·749
定 价	25.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在中国共产党 60 余年全国执政的历史进程中，1949—1956 年既因特殊的执政阶段名标青史，又因特殊的执政绩效彪炳史册；它既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的基础，又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的体制及原则。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不容忽视的历史局限性。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放在一个相对完整的政党执政系统中加以探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确立全国执政地位、探索执政方式、夯实执政基础以及总结执政经验的历史实践的考察与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特点。

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国共产党确立全国执政地位面临的压力、所做的准备以及确立执政地位的途径。

通过革命手段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伊始即面临着确立全国执政地位的重重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于执政主体，也来自于执政客体。前者主要是：党员干部数量的严重不足、党员执政理论与意识的模糊、执政作风的蜕化倾向、执政能力结构的不平衡及能力水平的有限。后者主要是：执政客体不仅是一个人口世界第一、面积世界第三的东方大国，而且是一个历经近百年的战乱，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面临着严峻形势的国家——政治上，国家尚未统一，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各种敌对势力的猖獗反抗与挑衅；经济上，由于战争的破坏、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国民党腐朽的统治，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濒临崩溃状态的国民经济；社会上，由社会经济改组而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

上述种种压力的存在使得国内外不少人对共产党能否巩固地确立全国执政地位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国内即有人扬言共产党军事上是100分，政治上是80分，财经上只能打0分；国际上亦有美国政府预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必将会被人口压力、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低下和民众的不满与动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所困扰，并最终陷入社会动荡与专制统治交替的恶性循环。事实上，就是从共产党自身来说，也不是没有担心。否则，毛泽东也不会有不要当“李自成”的告诫，不会有进京是去“赶考”的想法。然而，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有效应对了上述挑战，成功确立了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地位，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未雨绸缪的全面准备。这些准备主要表现为：积累了局部地区执政的经验；明确树立了全国执政的意识；明确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为全国执政理论；形成了全国执政的理念，包括目标理念（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宗旨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基础理念（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方式理念（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为确立全国执政地位有意识地加强了党的执政建设。正是有了这些准备，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全国执政初期成功地应对挑战，不仅在程序上而且在实践中牢固确立起全国执政的地位。

第二章主要总结中国共产党夯实执政基础的措施。

全国执政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执政基础状况，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短短七年内迅速夯实了执政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思想文化基础、阶级基础、群众基础以及政党组织的基础，从而为长期执政奠定了根基。

夯实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来之不易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从而夯实了党执政的经济基础。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扫除了经济发展的障碍，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使

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人民政权手中；通过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摧毁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是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开展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夯实政治基础。政党执政的政治基础是指其执掌政权所需要的一些政治条件，如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国家的主权、国家的政治制度，等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夯实政治基础的措施主要是：实现了国家安全与统一；恢复了国家主权的完整；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夯实思想文化基础。政党执政的实践表明，任何阶级要上升为统治阶级，都必然要把本阶级的思想变为整个社会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使群众认同这个现实，而且要使群众认同执政党的思想、观念，从而在思想文化上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为此，中国共产党着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全国人民，并在改造旧文化的同时发展了先进文化。

夯实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政党执政的依靠力量和支持力量。一个政党能否巩固其执政地位，关键在于有无巩固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首次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否成功夯实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对其执政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具有决定意义。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夯实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主要措施有：保障了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权力；维护了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利益；加强了对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思想教育。

夯实政党组织基础。政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即是执政党自身。打铁须要自身硬。政治上的强大往往要以组织上的巩固为保障。为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组织开展了整风整党运动、打击贪污腐败、教育党员干部、整顿基层组织等一系列整党建党活动，从而收到了夯实自身基础的实效，为中国共产党有效执政提供了组织保障。

第三章主要分析中国共产党探索执政方式的实践及其在探索中进行选择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无产阶级执政的特点和艰巨的执政任务，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实施全国执政的方式方法加以有效解决。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改变党的工作方式的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在探索中做出了选择：探索了一元化领导体制下从以党代政方式到党政分开执政方式的转变，并最终选择了以党代政的方式；探索了从依群众直接行动方式到依法执政方式的转变，并最终选择了依群众直接行动的方式；探索了从依政策执政到依法执政方式的转变，并最终选择了依政策执政的方式。

正如历史上众多事件一样，选择并不是某一因素直接作用的结果，而是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做出上述抉择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心理以及方式本身等方面的原因。

第四章主要回顾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第一次全面总结。

善于总结经验，并善于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成功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干部、推进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法。经过七年全国执政的生动实践，中国共产党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执政经验进行了深刻地总结，主要是：

总结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经验。经过全国执政的初期实践，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执政实践中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统统一，为此必须在继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总结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经验。经过七年全国执政的实践，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必须不倦地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抗击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为此，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无产阶级专政中的错误；必须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总结了领导发展的经验。首先要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其次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再次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最后要善于学习。

总结了应对执政考验的经验。七年全国执政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深刻感受到执政地位会使党面临许多与革命战争时期全然不同的新考验。中国共产党指出，在这七年中，“一般说来，我们党经受住了这种考验”。因此，对于如何应对执政考验，中国共产党及时进行了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执政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继续贯彻执行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本书在结语部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特点进行了总结。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结束距今已近60年了。从60年后的今天回望，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执政实践主要有三个特点：奠基性是其首要特点；开创性是其标志性特点；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执政通过领导来体现）是其时代特点。

前 言

政党执政研究是政治学学科的一个核心课题。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也是中共党史学科的一个重要课题。自新中国成立始，中国共产党即从一个执掌局部地区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成为一个执掌全国政权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其执政行为决定着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因此，在中共党史学科领域中，对中国共产党执政问题的研究一直都是热点。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地位——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过去党史研究者多侧重于从“领导”的角度来解读中国共产党执政问题，现在则更多地从“执政”角度来探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问题。虽然，从广义上说，党的领导可以包括党的执政，可以把党的执政看作是党对国家政权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领导。然而，正是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执政”不同于“领导”：

首先，确立途径不同。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党执政地位的确立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规定，党的执政表现为党的代表们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占主导地位，而这种主导地位又是通过法律程序——选举——才能获得的。党的领导地位则是通过其在社会生活（包括革命斗争）中的工作和活动所形成的与人民群众的一种事实性关系。这种事实性关系的确立，可以通过法律的规定（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可以不通过法律的规定（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其领导地位是在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的）。

其次，依赖基础不同。一个政党要确立和巩固执政地位，必须

要有巩固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阶级基础、群众基础以及政党组织的基础。对于政党执政来说，上述要素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对于政党领导来说，上述要素并不一定完全具备，如政治基础中的政权机构。党的领导并不以政权机构为支撑，没有取得执政地位的党也可以在社会事务或社会重大事件中起领导作用；党的执政则必须在国家政权机构内活动，没有国家政权机构的权力作支撑，执政党不可能在执政中贯彻本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

再次，方式方法不同。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当其处于执政地位时，它能够处理的社会公共性事务取决于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当其处于领导地位时，其领导性事务并不受法律规定的范围限制，政党可以在任何领域从事自己的领导性的事务和工作。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党的执政与领导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必然具有很大的不同。

长期以来，由于对党的“领导”与“执政”之间所存在的不同之处的忽略，将“执政”视同为“领导”，将“领导”泛化为“执政”，从一定程度上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因此，从“执政”的角度重新解读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活动是理论界的一个新的重要课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建设、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和重点，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一方面，建设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等对政党如何执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当时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丧失政权，也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警示。在此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曾提出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全党要“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的命题；200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大会又提出了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命题；200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增强执政能力”正式写入党章总纲；200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并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主体对执政问题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关注，推动了中国理论界对政党执政问题研究的深入。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历任领导核心都十分强调研究党的历史的重要性。早在局部执政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①进入新世纪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一个政党不善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②。因此，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执政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60余年的全国执政历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年）具有特殊的阶段特点及执政绩效，因而也就具有了特有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1. 特殊的执政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的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实现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转折阶段。然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为此后执政实践中出现挫折埋下了伏笔的阶段：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七大以后特别是建国头七年的历史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在这里转了弯。“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③回顾从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八大”就如一个分水岭,不仅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此转了弯,而且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在此转了弯。中国共产党此后的执政逐渐偏离了轨道,导致了中国社会长达20年之久的曲折发展。一个执政党,无论从什么地方学习,都不如从切身经历中,特别是从自己所走过的弯路和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更为直接、具体和深刻。因此,在60余年后的今天,重新探索这段历史,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执政历程,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2. 特殊的执政绩效

这一时期,执政的主体是一个经历了28年革命战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有一定的执掌局部地区政权的经验,却毫无执掌全国政权的经验。对其执掌全国政权的能力,时人曾讥为“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财经上0分”;执政的客体则是一个历经近百年灾难、经济濒临崩溃、人口世界第一、面积世界第三的东方大国。在这一时期,执政主体所要实现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一目标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极其艰巨的。然而,正如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所豪迈预言的:“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①。建国头七年中,首次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巩固了执政地位,而且成功地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1) 民主政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实现了从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中国人民的社会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的主人。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

在这七年中，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系统地建立起来，从而使民主的主体最大限度地扩展至全国人民，真正实现了大多数人的统治，人民群众对社会政治生活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参与热情，主人翁的责任感空前强烈。1951年11月底，全国36个^①省（行署）、156个市、2148个县（除46个外）都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全国第一次普选工作全面展开，有85.8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共选举基层人民代表566.9万名。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普选运动，它极大地焕发了广大人民的民主意识，大大推动了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1954年宪法的起草，更是经过了全国8000余人的讨论，宪法草案公布后，全国人民热烈讨论了两个月，共有1.5亿人参加。

（2）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发展

1949年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的新中国可谓是满目疮痍、百业待兴，整个经济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工业整体上处于手工业的状况，工业产品少得可怜，根本谈不上工业体系。据统计，1949年中国工业的年净产值只有45亿元；农业还停留在手工耕作、靠天吃饭的水平上；交通运输工具落后，畜力车和木帆船等民间运输工具仍然大量使用；市场上商品严重匮乏，加上物价暴涨，大多数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的。

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至1952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倍，农业总产值增长48.5%。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超过了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最高年产量。与此同时，国民党执政时期遗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也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在此基础上，新中国的执政党适时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① 本节统计数字除特别标注外均见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1949—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并使国民经济在稳定协调的基础上取得很大的成就：“一五”时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2%，工业年均增长 18%，农业年均增长 4.5%；产业结构有了很大改进，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的比重由 43.1% 提高到 56.7%，上升 13.6 个百分点；农业生产得到了巨大发展，粮食生产增加了 3110 万吨，棉花产量增加了 34 万吨；工业生产发展迅猛，原煤产量增长 98.5%，原油、发电量、钢、机床产量分别增长 1—3 倍，特别是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所没有的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新式机床、发电设备，以及高级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冶炼等新工业部门都先后建立起来。此外，交通运输事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新建铁路营业里程 4162 公里，新建公路 8.3 万公里，增加沿海吞吐能力 765 万吨。

（3）人民生活得到迅速改善

国民党执政末期，中国的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市场萧条，物价飞涨，广大人民饥寒交迫，失业现象严重。据 1948 年 3 月 24 日《新民报》报道，1948 年的 1000 万元，仅折合 1937 年的 27 元。1948 年秋，仅北京市的赤贫户和次贫户共 68000 户，人口 246000 人，约占全市人口的 24%。至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时，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现金收入还不足 100 元。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采取措施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物价，安排就业，以安定人民生活。全国执政后，随着经济建设的恢复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据统计，1952 年全国人均现金收入增加到 156 元，增长 56.8%；1957 年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 254 元，比 1952 年增长 62.8%，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48.5%，平均年递增

8.2%^①。特别是随着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农民收入迅速提高：194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4元，1957年增长到72.9元，年平均增长8.2%。^②

（4）社会问题得到有效治理

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伊始，即面临着国民党执政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城市充塞散兵游勇、灾民难民、大量失业人员和流浪乞讨人员，小偷、流氓、妓女等遍布街头，妓院、烟馆和赌窟四处林立，鸦片烟毒到处弥漫。对此，新中国的执政党积极采取措施，资遣国民党散兵游勇，取缔娼妓，禁烟禁毒，改造游民，解决失业，从而有效地进行了社会治理，旧中国猖獗千百年的各种社会丑恶，在这一时期都曾偃旗息鼓：至1950年底，资遣国民党散兵游勇400多万人；至1952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取缔娼妓工作；至1953年，各地400万吸食鸦片烟毒者陆续戒毒，鸦片烟毒在中国基本禁绝。

（5）国家独立和安全得到真正的实现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间，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凌掠夺。新中国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结束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屈辱的外交历史，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而且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展示了新中国外交大国的魅力。特别是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全国执政之初，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全力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势力和影响，不承认国民党执政时期同各国政府的旧的外交关系，

① 据统计，1978年到1998年，扣除物价因素，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2.2倍，平均年递增6%。

② 此百分比为笔者推算。

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1949至1955年,中国先后同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共和国、蒙古、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瑞典、丹麦、缅甸、瑞士、列支敦士登、芬兰、巴基斯坦、英国、挪威、荷兰、南斯拉夫、阿富汗、尼泊尔等共计26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①

(6)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1953年,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在城市和农村中都已成为主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得到了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中国此后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社会是逐步走向稳定和繁荣的。“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②;“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③;“建国后的前八年我们搞得不错”^④。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工作确实被浓墨重彩地写在了历史上。

完善党的执政理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借鉴自身的经验是最主要的途径。不善于总结自己经验的党,很难说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向来善于从自身的传统中寻求智慧。然而,我们一说到学习经验,特别是学习执政经验,往往是强调“与国际接轨”的多,强调学习自己经验的少;强调古人经验的多,强调20世纪经验的少;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执政经验的多,强调新中国成立初期执

① 与英国、荷兰建立的是代办级外交关系。参见《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1949—1955》,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④ 同上书,第269页。

政经验的少。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历史阶段所取得的特殊执政绩效已经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以积极的姿态学习、研究和继承党的执政经验，对于提高党在新时期的执政能力，促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都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